

言内语境研究述评

彭利元^①

语境和语义密切相关, 语言哲学界对语境的关注由来已久, 并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在现当代语言研究中, “语境”已成为人类学、逻辑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翻译学等多门学科普遍关注的话题。在这种学术背景下, 对语境研究追根溯源, 理性地回顾总结语境研究的发展源流, 对于深刻认识语境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语境理论在西方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 (1) 言内语境研究阶段; (2) 情景语境研究阶段; (3) 文化语境研究阶段; (4) 跨学科语境综合研究阶段。本文仅对语境研究的初始阶段——言内语境的研究进行评述, 探讨语境范畴随人类对语言认识的加深而不断扩大的趋势, 揭示语境范畴扩大的内在动力, 以及言内语境与情景功能的密切关联。

言内语境包括言语和语言两大部分, 不仅包括言辞上下文——文本中的前言后语, 也包括语言系统本身。一般所说的语言语境, 包括微观语言语境和宏观语言语境, 前者指句子语境, 后者指篇章语境, 同属于笔者所说的言语部分。

一 弗雷格以前的语境研究

西方语境理论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工具论》“论解释”篇中指出, 口语是思想的符号, “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 书面语言是口语的符号”;^{[1]55} 思想或语词不是孤立的, 而是存在于和其他思想或语词的相互联系之中, “孤立的思想或语词既不是真实的又不是谬误的, 真实和谬误只能属于思想或语词的若干结合。”^{[1]51} 他在讨论名词的意义时说: “所谓名词, 我们是意指依据惯例的一种有意义的声音。它同时间无关, 而且它的任何一部分要是离开了其他部分就没有意义了。”^{[1]56} 例如, 他认为“良马”、“贼船”这两个名词中的“马”和“贼”, 在这样的上下文中没有独立的意义, 其意义就在于它们对该语词整体的贡献。这种思想看到了思想、意义与“相互联系”的关联, 这实际是一种深刻的语境思想。他在区分意谓 (signification, 即“所指”) 和意义 (meaning, 即“内涵”) 时也指出, 所有语词的意义 (无论是否有意谓) 都取决于使用者。^{[2]16} 这充分证明语言使用者作为一种语境因素在亚

里士多德那里已受到关注, 语言意义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语境的作用, 暗示着意义和语境的本质关联。

中世纪, 哲学家们开始注意在命题中考察语词的具体意义。在他们那里, “语词不再作为与它们的语言上下文或语境完全分离的单位来研究。吸引着人们强烈兴趣的, 毋宁说是语境本身。”^{[2]18} 甚至不再把语词当作意义的基本单位, “是陈述 (命题) 而不是语词, 被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3]161} 也就是说, 语词的意义只有在陈述 (命题) 中才能把握。黄振定教授评论说, 他们的出发点还是立足于哲学的“名”、“实”关系来谈论语词的意义, 把种种意义最后归结到语词所指谓的实在本质、概念、心理经验之类, 以还原语词和指谓的一一对应关系, 具有明显的逻辑化研究的局限性。^{[2]18}

近代, 尽管许多语言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语境问题, 但没有明确提出根据语境来确定所指这类原则。如奥古斯丁等人在区分能指 (signifier) 和所指 (referent) 时指出: 能指是语词名称本身, 所指是语词的意谓 (signification); 名称或能指与所指或意谓的关系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 名称通常单地指称对象; 但在命题中, 它们却可以引申出多种意谓和意义。“这一观点首创性地突破了孤立语词的考察而扩展到较大的句子单位和实际运用”,^{[2]67} 为语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但真正明确提出以“语境原则”来把握意义的, 还是 19 世纪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 可以说, 弗雷格是西方语境理论发展的里程碑。

二 语境原则的提出

在《算术基础》一书中, 弗雷格首次提出“语境原则”。他从数的意义出发提出, “数的给出包含着对一个概念的表达”,^{[4]71} 即概念是数的承载者, “数”必须在命题中在与其他词语或物体的联系中才有意义, 不存在一个客观的“一”, 也不存在抽象主观的“一”, 只存在“一棵树”、“一朵花”这种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的数的概念。数的意义是在和具体事物的联系中获得的。为把握数的概念, 他提出三个基本原则, 即: (1) 把心理学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 (2) 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意谓, 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意谓; (3)

① 收稿日期: 2007-09-12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翻译语境学研究”(04ZC100)。

作者简介: 彭利元, 男, 湖南隆回人,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语境主义认识论。

要时刻看到概念和对象的区别。^{[5]49}

这里的第二条原则就是著名的“语境原则”。他认为数的得出,需要到含有数的句子中去分析,“如果我们不能有关于数的表象或直觉,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一个数呢?语词只有在句子联系中才意谓某种东西,因此重要的是说明含有一个数词的句子的意义。”^{[5]50}弗雷格研究专家达米特(Michael Dummett)称,弗雷格这种对数的语言分析方法是“哲学中所谓‘语言转向’的第一个典范”,^{[6]111}开启了分析哲学的先河。

语境原则对于一般语词的意义理解和把握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弗雷格本人也分析了专有名称如“柏拉图”、“伦敦”等实体名称的意义问题,认为这种名称也只有在一定语境中才能获得特定的摹状关系,才有确定的指称和涵义。而且,弗雷格最初提出语境原则时,也没有区分“意义”和“所指”,因此,语境原则应该在一般意义上来理解和把握。达米特在评论弗雷格的语境原则时说,“作为与意义有关的原则,我们可以认为,语境原则就在于说明,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就在于专门与它在句子中的作用相联系,并且在于对任何有它出现的句子所表达思想的贡献。”^{[6]184}王路也认为,既然弗雷格在提出语境原则时没有明确区分意义和所指,后人在理解该原则时也不应作此区分,而应对Bedeutung作一般的字面理解,既包括意义,也包括所指。

弗雷格把握了“句子”这个重要的意义单位,继承了中世纪在命题(句子)中把握语词意义的思想,确立了句子分析在意义分析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人们必须总是考虑完整的句子。……如果句子作为整体有一个意义,就足够了;这样,句子的诸部分也就得到了它们的内涵。”^{[5]50}达米特评论说,“语境原则的核心意义是对句子作用的强调,也就是说,……语词必须在句子中去理解。”^{[5]55}

语境原则突出了语词及其句子语境的一般意义关系。从句子语境出发,可以找出该句子所有相关部分的内涵和意义。句子作为整体,在语言研究中获得了特殊地位,它决定着其中语词的意义。正如达米特所说,“语境原则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个词的意义与含有它的语境的一般关系;它找出作为句子的整个语境的相关部分,因而使句子在语言中有一种特殊而独特的作用。”^{[5]55-56}

由此可见,句子是意义的基本单位。弗雷格的语境原则就是以句子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言内语境分析原则。句子为先,语词为后,必须在句子中分析语词。

三 语境原则的传播

弗雷格的语境原则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作为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传播开来,日益成为现代语言哲学的热门话题。这得益于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对弗雷格语境原则的引用推动了语境思想的传播。他说:“只有句子才有意义,

只有在句子联系中一个名字才有意义。”^{[7]33}这一思想在他后期的研究中更加明确。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进一步发挥了语境原则。他说:“一个字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8]31}他把命题中规定有意义的每个部分叫做表达式(或记号),把名词看作原初符号,认为“要在符号上看出记号,必须观察有意义的用法。……一个符号若是无用的,便是无意义的。”^{[9]28}即一个词的意义就是由它在有意义的语句中的作用决定的。

后期维特根斯坦与弗雷格不同,他不再关注逻辑语言,而是关注活生生的日常语言。这样,弗雷格的语境原则被发展为对人类日常语言实践的研究,从而显示出普遍的指导意义。斯鲁格(Hans D. Sloga)甚至说,弗雷格的语境原则应该换成这种说法:“对语言的研究,本身必须被看作是对人类实践的研究。”^{[10]398}在他看来,理解一个词语的意义,从哲学意义上来说,需要理解包含该词的句子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价值。

达米特在构建自己的意义理论时进一步阐发了弗雷格的语境原则,强调了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的观点。他指出了弗雷格把句子看作专名的局限性,认为弗雷格把句子的真假看作句子的所指,寻找句子和语词的共同点,这实际上忽略了语境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句子是语言中可以表述思想的最小单位,从而取消了句子在语言中的特殊地位。^{[11]195-196}他认为,构造意义理论首先应该回答“意义是什么”的问题,这种回答应该遵循以下原则: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词功能多样性的原则;弗雷格的语境原则和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使用”原则;“意义的非具体化”原则。徐友渔在“达米特”的评传中总结说:

这种回答应尊重以下原则,第一,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词功能多样性的原则,对于“一个词意指某物”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统一的回答。第二,弗雷格的语境原则,一个词只有在句子的语境中才有意义,这还需要加上维特根斯坦的进一步的原则:理解一个句子就是理解一种语言,只能把词的意义解释为它对包含有它的句子的意义的贡献,只能根据句子在语言中的作用来解释句子的意义;第三,这是可以被称为“意义的非具体化”原则,它说的是,我们决不可期望能达到形如“词X的意义是……”的说明,最多能得到这种形式的说明:“X意指它的确意指的东西是……”。^{[12]201}

达米特这里的第三条原则是针对戴维森(D. Davidson)的意义主张的,因为戴维森认为,一个恰当的意义理论必须包含如下形式的一切句子:S的意义是M。其中S为某个句子结构的描述,M为句子意义的表达式。第一、第二两条原则是对语境原则的进一步强调和深化。

达米特在阐发上述原则时进一步强调,语言中的词和句子意指某种确定的东西,是因为它们在社会实践中具有某种作用。也就是说,词和句子的意指是由它们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决定的,即由语言的使用决定的。而语言的使用和实践是由理性的主动者完成的,必然带有主动者本人

的动机、目的和意图。他说,“如果不把语言的使用描述为理性的主动者的活动,描述为具有动机、目的、意图,这种说明是没有说服力的。”^{[12]201}这说明,语言的意义不仅由语言的使用决定,而且是由理性的人有目的的使用决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深化和加强了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及其意图论的理论价值。

达米特既看到了句子意义的相对完整性,也看到了句子意义对其他语言单位的依赖,但从总体上说,他的意义观主要着眼于句子层面。他说,“一个可接受的意义理论必须至少是分子论的,它的涵义理论必须陈述一个说话人关于任何句子的意义的知识是怎样表现出来的。”^{[13]58}也就是说,他认为意义理论至少应该在句子层面建立。他还坚持认为,尽管句子不可以单个地、孤立地理解,但理解一个句子不需要理解整个语言,而只需要理解语言的一部分。^{[12]208}

但是,达米特在后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自己的语境观。郭贵春等人认为,达米特的语境观现在已经发展为一种动态的真理观。^{[14]233}这与语境观的最新发展相一致。达米特从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等多个角度,对真理的形态进行语境考察,阐述真理的历史性和修正性,认为真理需要放在动态的语境中来考察,不存在“普遍接受”的真理。语境形式和内容、言者意向及文化取向的变动等等,往往使真理不断得到修正。可以看出,语境理论在达米特身上也体现着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推进的发展轨迹,表明语境研究突破言内语境局限的必然趋势。

四 对言内语境研究的评论

尽管上述哲学家主要关注的还是句子,注意从句子出发把握词语意义,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突破句子的局限,把语境拓展到语言外的现实,即社会情景,甚至扩展到人类心理、意向等等,从而蕴育了情景语境研究的萌芽。即使在语境原则的奠基者弗雷格那里,也并未完全局限于句子层面。他在《概念文字》的序言及后来的一些文章中,多次阐述语言的不完善性,认为在较抽象的科学表述方面,语言不能保证表述的准确和易解;在逻辑表达方面,语言同样存在缺陷,遵守语法并不一定保证逻辑表述的正确性。^{[5]27}看到语言的不完善性,实际上是看到了句子分析的局限性。弗雷格没有对该问题做进一步阐述,但其对语言不完善性的论述启发了人们的思维,推动语境研究突破句子范围,进入更加广阔的领域。达米特在评论弗雷格的语义思想时说,弗雷格的语义思想实际上隐含着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的思想。^{[15]71}

由此可见,以句子为语境的意义分析在历史上实际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但是,作为可以表述思想的最小意义单位,句子的分析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句子在语言中有着交通枢纽的地位,往下它管辖句中语词的意义,往上它是语段、语篇的最小意义构建单位和基本单元。词和句、句和段(语篇)是密切关联的。然而在语言学研究史上,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存在着割裂语词和语句、语句和语境的倾向和做法,在语言本体内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语言结构研究方法,即语法学和篇章语言学。前者通常研究单

个、孤立的句子,研究词的形式和用法、句子各组成部分及其安排规律;后者则研究交际中的语篇,研究语篇中句子的排列及衔接连贯。传统语法、结构语法,以及转换成生成语法,都仅仅局限于句子本身及其组成部分来研究语言,不研究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联,也不讨论句子在更大语言单位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与弗雷格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正如一个词语在不同的句子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和句法功能一样,一个句子在不同的语篇和语境中也具有不同的表意作用和交际功能。不把句子放到更大的语言环境中去考察,就无法确定其真正含义。离开语言的使用场合和特定的语言环境,就很难确定语言单位的交际功能,语言单位也无法充分有效地起到交际的作用。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注意力从句子(命题)的逻辑意义分析转向交际中实际运用的语篇的研究,从语篇层面来把握句子的意义和功能。20世纪50年代,篇章语言学应运而生。

篇章语言学的诞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语词意义、句子意义的认识。语篇分析从一开始就和情景语境理论有着密切关联,因为语篇(会话)分析最先是由情景语境的研究者、伦敦学派创始人弗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语篇分析的成功研究也首先表现在援用弗斯学派方法的领域,如米切尔运用情景语境理论,根据交际参与者和情景等因素把买卖行为分为若干阶段。^[16-18]尽管从理论上说,语篇分析仍然属于言内语境范畴,属于宏观言内语境层面,但是实际上,没有和情景语境相分离的语篇。语篇分析必然涉及到语言外情景,所以,语言的语境分析一走出句子范围,就踏入了情景语境范围,进入语境分析的第二个阶段——情景语境分析阶段。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 工具论[M]. 李匡武,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 [2] 黄振定. 翻译的语言哲学基础[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 [3] Kretzmann, Norman et al.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 From the Rediscovery of Aristotle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Scholasticism, 1100-160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4] Frege, G.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J. L. Austin (Tra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56.
- [5] 王路. 弗雷格思想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 [6] Dummett, M. Truth and other Enigmas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7] Wittgenstein, L.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C. K. Ogden (Trans.) [M]. London: Routledge, 1981.
- [8] [英]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汤潮, 范光棣,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下转第152页)

尺,自己想了多少年了,迄今竟然还在迟疑着没下决心迈出第一步,与陈先生现在70高龄了还在为撰写新著四处奔波相比,真令人汗颜。

其三,陈先生的领袖人物传记在处理文学性与历史性的关系上也恰到好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样板,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陈先生认为:“写传记文学要达到人物的真实性和表现的艺术性的统一,它既是历史,又是文学,但不能随心所欲,随意编造,必须以史实材料作基础,正确处理好历史的真实性、科学性与文学的审美性、虚构性的关系。因此,它要求作者花大气力、下苦功夫搜集、采访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口头资料,而后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精心构思、选材、描写、叙述,特别是注重人物性格和细节的刻画。”^[1]³¹⁰这是传记文学处理真实性与艺术性关系很经典的表述。在写作实践中,陈先生也是这样去做的。他的勤奋前面我们介绍过了,而在采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每一部书、每一章、每一节如何取舍,怎样进行艺术构思和细节刻画,陈先生都是非常讲究和审慎的,他的《胡耀邦传》更是媒体所称的“十年磨一剑”。

在翻阅陈先生的作品时,我们可以深刻感觉到他在叙事和人物细节刻画上的技巧和功力。如写陈明仁性格倔强,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中“敢于犯上”时,就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如何在昆明军事会议上面对蒋介石和所有“着装整齐,军衣笔

挺,皮鞋锃亮,肩章生辉”的将领,而独自嘲讽般地穿着士兵破棉衣,令蒋大为不满;后又如何因类似的事两人怒目相视,针锋相对;蒋如何以“诬蔑领袖”罪两次叫来宪兵,当场要押下陈明仁予以惩治,可他却始终不肯低头服软的情景……真是惟妙惟肖,跃然纸上。^[2]不像有的传记作家,别人批评他记载的人物和历史失实,他说自己的著作是“文学传记”;而当别人批评它可读性差,他又说是“历史传记”或“纪实性作品”。跟人捉迷藏,让人啼笑皆非。

陈先生称自己是一个“年轻的老人”,生活俭朴,听其自然,知足常乐;但笔耕不停息,无止境,声称要“活到100岁,写到90岁”。很早以前,他就定下了写10个伟人或名人传记的奋斗目标。现在已完成6部,近年又在为撰写《陈独秀传》东奔西忙。对此,我常常怀着深深的敬意,心里默默祝愿陈先生健康长寿,并期待着他的新著早日问世。

参考文献:

- [1] 陈利明. 名人忧乐[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
- [2] 陈利明. 陈明仁将军传[M].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5: 102-111.

(责任编辑:黄声波)

(上接第149页)

- [9] [英] 维特根什坦. 名理论(逻辑哲学论)[M]. 张申府,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 [10] [美] 汉斯·斯鲁格·弗雷格[M]. 江怡,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11] Dummett M. Fre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1981.
- [12] 徐友渔. 达梅特[M] / 涂纪亮.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语言哲学卷).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177-214.
- [13] 迈克·达米特. 什么是意义理论?[J]. 哲学译丛, 1998(2): 54-69.
- [14] 郭贵春, 王航赞. 达米特的语境真理观[J]. 学术论坛, 2003(1): 20-25.
- [15] 迈克·达米特. 什么是意义理论?[J]. 哲学译丛, 1998(3): 57-69.
- [16] Mitchell T. F. The Language of Buying and Selling in Cyrenaica[J]. Hesperis. 1957(44).
- [17] Halliday M. A. K. and R. Hasan.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9.
- [18] 黄国文. 语篇分析概要[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6.

(责任编辑:文爱军)